# 瘟疫中的“人”

陈铭哲 60971060 SLST

自“疫苗改变世界”一课四周以来，除了课上所提及的科学史相关的知识外，由于朋友的推荐抑或是自己的兴趣，阅读了理查德 普雷斯顿描述埃博拉疫情的纪实文学《血疫》，加缪的《鼠疫》，与关于SARS的《SARS十年回响》（国内很少找到有关那个时期的详细记录）。

如果说“疫苗改变世界”一课所描述的是疾病与疫苗斗争史上的卓越个人和他们的贡献与理论的话，那么无论是《血疫》还是《鼠疫》，都不再从理论上，而是用温热的皮肤去感受瘟疫真实的模样，死亡不再是一个个冷酷的数字，而是一具具温热的躯体，一个，加一个，再加一个。我更愿意从隔离室内外父子亲人的离散时的痛苦，病床前护士留下的汗水，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来看待瘟疫真实的面貌。相较于用数字与图表的叙事框架，我觉得，疫情，特别是像《鼠疫》中所提到的无药可救的瘟疫，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让人们去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去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鼠疫，埃博拉还是SARS，他们在爆发之初都有诸多共同的特点：可在人群之中进行传染，并且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没有疫苗可以免疫，由于疫情刚刚爆发，也还不存在被动免疫的手段，也没有有效的药物进行治疗，一旦确诊，就相当于被推上俄罗斯转盘的赌局，在5/6的概率中迈向死亡，或是在1/6的概率中侥幸存活。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埃博拉、鼠疫或SARS就不再是研究员之间茶余饭后的话题，而是大众的视野中，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存或者是死亡的同义词。

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有可能被宣判死刑的世界里，人们便不再是过去的那些人，某些平凡的精神由此而凸显，某些丑陋的行为由此而得到默许，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行事准则与价值判断都得到某种程度的异化。

不妨想象一下，当你面对着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的时候，一个正常人的反应会是怎样？多半是选择远远避开，越远越好？但是拆弹队员则不同，他们的职责是在这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弹药面前，寻找破解炸弹的思路与方法。而加缪在《鼠疫》中描绘的场景则更为的戏剧化：里厄医生无法找到拆弹的思路，或者说（由于作者的安排）注定不可能找到拆弹的思路，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远远退开躲进实验室里研究《炸弹安置的哲学与艺术》，而是一次又一次冒着被炸伤的风险，徒劳地进行拆弹的尝试。在自然面前，里厄是令人绝望的弱势，鼠疫这一千百年来不断骚扰人类的疾病，即便到他那个年代，也不存在行之有效的疗法，医生所能做的，只有诊断病人并且加以隔离，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做的话，也不过是为病人进行临终护理，切开淋巴，缓解病人的痛苦，而病人的痊愈与否，完全与他无关。在文本中里厄与他的好友塔鲁有一段非常精髓的对话：

“

‘但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如此而已’

里厄的面容显得阴沉了。

‘永远，这我知道。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当然，这不是理由。但我因此可以想象，这次鼠疫对您意味着什么。’

‘不错，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

”*【1】*

这也是作者加缪想要表达的主旨之一：即面对绝望的世界，人虽知自我身处绝望却仍奋起斗争的精神，即便这种斗争是徒劳无功的。

面对着致命的病菌，医生亦或是研究人员身上往往保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情绪：一种是面对天灾的这种深深的无力与绝望，另外一种是面对绝望仍然抗争的心情，而在斗争的尽头，兴许就会点亮希望之光，虽然有人可能不等希望之光的出现人就已经听从死神的召唤，但是总的来说，熬到最后就是尽头。

无论是里厄医生，还是《血疫》里的南希研究员，抑或是SARS中奋战在一线的护理人员，当问及为什么不选择退缩，为什么不选择放弃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却惊人的相似“因为这是我的工作”。里厄解释他看不惯有人在他面前死去，当然他也不能选择无视切切实实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所以他选择了行医。作者加缪营造了“城市封锁”的背景，在因疫情而被封锁的城市中，人们只有两种选择：顽强而无谓 地斗争，或者是放弃斗争。前路遥遥，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没人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缓解，无论是哪种选择人们都必须面对绝望而遥遥无期的现实。正是在这种绝望中，却能不显自暴自弃，不屈服于命运，仍然坚持履行自己的责任的，就是黑暗中的那点烛火，更是人类精神的光芒。

现实中的人们未必会经历加缪所刻意塑造的极端的绝望情绪，不过在尚无治疗方法的病原体面前，多多少少带着对未知的恐惧与对性命的担忧。医护与科研人员并不是不会害怕，正如发现自己可能无意中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下的南希研究员，在发现自己手套破了以后，她立刻走出生物安全室，并且反复地进行消毒与检查，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可能的潜伏期，方才舒了一口气。他们并不是不会恐惧，只是这是他们的工作，这是他们的一种责任感，倘若连医护工作者都不去直面第一线，科研人员无人研究高危病毒的话，整个人类的防线会倾然崩溃。事实上是，每当重大的传染病爆发的时候，医院便成了疫情最严重的“灾区”，倘若没有做好隔离防范措施，很容易便会出现医院中医护人员被大规模被感染的状况，在广东最初接诊SARS患者的几个医院，便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在现实之中，大众对于疫情的态度却又是非常微妙的，《鼠疫》一书中，因为城市被政府封锁，因此在这样一个封闭空间中，大家似乎都成为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无论是里厄医生还是路人，面对的绝望是相同的，因此出现了由民众自发组织的防疫队，协助医生平日的工作。加缪也正是想通过这一点来说明人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人面对绝望而进行的抗争也绝非个例。但是现实之中，很多人对于疫情仍然采取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离炸弹越远，自己被炸到的概率就越小，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处理疫情的医护人员也存在着某种偏见，人性的丑陋之处也由此可见。只有将自己与他人纳入某种命运共同体之下的时候，才会出现《鼠疫》中所描绘的主动抗争的场景。

幸运的是，一切终归过去，正如里厄在鼠疫结束后，收到在外养病妻子去世的消息时的场景，“固执地在窗口出神地欣赏海港壮丽的晨景”*【2】*。无论是鼠疫还是血疫还是SARS，也确实多亏了人类面对绝望而抗争的精神，我们一次次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一切过去以后，看向窗外壮丽的风景，而由此悼念逝者。

*Ref：*

*[1] 《鼠疫》 加缪 著 刘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110*

*[2] 《鼠疫》 加缪 著 刘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258*

*[3] 《血疫》 理查德 普雷斯顿 著 姚向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4] 《SARS十年回响》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人民卫生出版社*